

我刊今年12月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擬以「毛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命運」為題，廣邀海內外作者，深入討論民主主義型左翼思潮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以及當今中國大轉型時代的複雜影響力。熱切歡迎各界作者參加這次筆談盛會。

——編者

也說俄國革命之發生

金雁的《倒轉「紅輪」：俄國知識份子的心路回溯》討論知識份子與革命、社會革命與政治建設的關係。王進文在〈誰製造了俄國革命？〉（《二十一世紀》2013年6月號）一文對金書的解讀非常清晰，但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筆者仍有兩點疑問：

第一，東正教是革命烏托邦的來源嗎？金雁認為，激進的革命烏托邦是與東正教一元論結構相一致的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中國的儒家傳統本質上是世俗化的、非宗教的，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思潮也有從民粹主義到虛無主義再到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軌跡。二十世紀的革命作為全球性的現代化浪潮，外來因素的作用絲毫不亞於革命國家的內部政治結構。革命的象徵主義和意識形態首先產生於基督教世界，繼而被強大的政治力量向全世界推廣。

第二，民族主義的因素如何安放？民族主義是革命運動的引擎。現代革命以農民為主體，而農民革命因民族主義興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起所致。民族主義對於現代國家鍛造之意義不言而喻，它摧毀傳統權威而代之以「國民」和「人民」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合法性來源。民族主義雖經由知識份子的傳播才會發揮作用，但它畢竟是一個系統性的意識形態。知識份子的心路歷程固然重要，但革命是社會多種功能性障礙的產物，非單一群體的動員與行動所能觸發和完成，需要有人運作以及所有群體參與，包括統治者。

郝娜 南京
2013.6.22

「後改革」時代的革命想像

余盛峰〈革命恐懼的幻象〉（《二十一世紀》2013年6月號）一文分析「後改革」時代中國的思想光譜，揭示了「革命」與「保守」背後複雜的思想困境和利益糾結，並認為：利益衝突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就會以觀念重組的方式展現。從某種程度上說，自由主義和新左派是圍繞市場機制展開的討論，而「保守」與「革命」之爭則代表政治危機的加劇。這判斷有一定說服力。當前的「革命」與「保守」之爭的複雜性遠遠大於當

年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由於精英群體的意識形態共識已分崩離析，其內部不同群體對於「革命」、「保守」的想像存在諸多差異，不僅表現在「革命」與「保守」的對立上，還表現在同一陣營內部，甚至同一個人或群體也能毫不費力地在「革命」與「保守」之間轉化立場，出現「革命」與「保守」的「協奏」。

喪失思想活力與社會控制能力的精英群體對「革命」與「保守」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精英集團營造出來的幻象。而且，精英與民眾之間迅速分化造成社會的斷裂，也加劇了精英對底層社會的恐懼。由此，精英對危機的回應，既有可能採取保守的姿態，也可能訴諸革命的激情；草根民眾對挫折的回應，既可能呼籲自由與民主，也可能寄託不同革命神像的公平訴求。此外，隨着新傳播革命的迅速升級，中國社會舊有的社會運動和社會動員方式被深度改寫，這無疑加劇了精英群體掌控社會的難度。精英群體對社會風險的想像與感知，必然會影響到對「革命」與「保守」的理解和選擇；另一方面，民眾也不再是旁觀者或被動的參與者，他們

會以自己的方式給「革命」、「保守」賦予新的涵義。

張濤甫 上海
2013.6.19

何謂中國「開放」的邏輯

中國的政治發展蘊含着何種內在的邏輯，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心的熱點問題。岳健勇的〈發展主義的開放邏輯——中國加入世貿的背後〉（《二十一世紀》2013年6月號）一文，以中國加入世貿作為研究的切入点，指出中國市場化改革取向的發展軌迹，是為了解決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問題，將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之上，才不計成本地毅然加入世貿組織。這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改革開放的實質。

關於有效性與合法性的問題，李普塞特 (Seymour M. Lipset) 提出，經濟增長與政治民主化存在着相關性，承認政黨執政有效性的增強對於提升執政合法性具有積極作用。中國人持有一種實用理性，重視從系統的、長期的角度來客觀地考察政策的效用，傾向於在政治有效性的累積過程中進行合法性建設，並促進兩者形成良性互動。這就能解釋岳健勇提出的中國為甚麼會不計成本地加入世貿的問題。

實際上，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既要求根本改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傳統面貌，又仍然需要保存傳統中有生命力的合理的東西，即「開放」的現代化進程必須結合中國的實際才能真正實現。

馮志峰 南昌
2013.6.23

民國兮，民主乎？

二十世紀伊始，民國草創。然而民初政治卻並沒有按照革命者預想的軌道發展。馬飛在〈革命文化與民初憲政的崩潰〉（《二十一世紀》2013年6月號）一文中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革命黨並沒有建立起理性的政治文化。在馬飛看來，革命者自身的種種缺陷與舊制度影響下的各種專制主義導致民初的憲政崩潰，並通過孫袁之爭、憲法之爭、議會之爭等民初的各種權力之爭體現出來。這些理解的確有助於我們打破傳統政治史中片面強調袁世凱消極影響的定式，從革命者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來分析民初民主政治問題。

但是馬飛似乎陷入另一誤區，他過多地將這些問題從袁世凱歸結到革命者自身，他看到了一部分革命者的暴力集權主義傾向，卻又忽略了一點：無論是南京政府還是北京政府，無論是遷都之爭還是憲法制訂過程中，甚至在袁世凱操縱的總統選舉中、孫中山的討袁鬥爭中，依舊有議員選擇說不。此外，即使革命者的性格與思維方式帶有種種缺點與問題，但是正如民主制度本身的發展一樣，這些弊病自身也是一個讓民主不斷博弈、學習的機會，將民初政治歸納為問題叢生的一潭死水有欠公允。

王翔 北京
2013.6.15

革命創造還是終結自由？

甘儒彬 (Robert T. Gannett Jr.) 的〈舊制度與大革命——通

往自由之路？〉（《二十一世紀》2013年6月號）一文再從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視角出發，對革命與自由問題給出了全新解讀，甘認為革命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具有兩張面孔：一方面試圖建立專制的政治強人會利用民眾的情緒鼓吹民粹主義；另一方面革命也可以讓公民學會在改造社會和自我克制之間尋找平衡。可惜作者急於將法國拿來和中國進行比較，而中國革命的內在目的是否通往自由，這是一個值得懷疑的預設前提。

甘儒彬提供了三個可供反思的普遍性議題，這對於中國來說同樣適用。一是公民組織 (協會) 有助於公民的團結，政治組織的自治亦可以遏制權力的腐敗和專斷，所以支撐一個自由的社會需具有行動能力的公民。二是革命的激進往往伴隨着政治強人對改造社會不切實際的空想，政治強人依賴強大的政府權力來指揮、調動並控制一切。三是自由的公民社會必然是建立在健康的個人品格之上，但金錢和欲望又會腐蝕個人品格。

甘儒彬對上述問題提出了解決之道，即在自治的基礎上，成立各類協會、非政府組織，以此構建公民社會。它可以讓公民建立起相互之間的紐帶，可以抑制政治強人不切實際的空想，抵制專制權力對社會的過度干預，還可以使公民在參與中學會自律和克制，培育公民社會所需的自由精神。

楊龍 北京
2013.6.20